



这个春天，我入围了一个电影驻留项目，在北京的野长城脚下做了一个月的片子。项目的名称是我建议的，Loser（失败者——编者注），后来主办人音译成中文，成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。

Loser，曾经我是。
高中害怕数理化，嗜睡，睡着睡着，有一天醒来突然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。我在数学课上看《围城》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，问我这学期看了几本书，我说我喜欢一本书反复看，老师笑着说那你接着看吧。那时候看的书很简单，过期的《文艺风赏》在学校门口卖五块钱一本，我拿来看里面的短篇小说，当成很严肃的文学作品来学习。也许是从小在妈妈的房间里偷看《小说月报》，在马桶和书桌前看多了成年人的情感世界，对于这些文字多少悟出了些套路。中年人写小说无非是写婚姻家庭，故乡童年，职场争斗，还有或明或暗的个体影射。

我习惯阅读纸质书籍，小说的来源有限，于是开始偷偷在手机里看电影。电影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我把之前用来睡觉的时间全部用来看电影。我在晚自习上用四个小时看完一部《乱世佳人》，真的是目不转睛，身边全是写试卷的刷刷声，只有我拿着手机看电影。

高二时就有机构去我的学校推荐艺考培训的课程。我所在的高中

是一所省示范中学，走艺考的学生几乎没有。而我发现电影与文学让我如此痴迷，何况，艺考让我觉得有一个正当理由不学习数理化课程了。于是，我疯狂地熬夜看电影，写影评给学姐看，学姐夸我一定能考上中戏或北电，写故事时学姐也夸我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从小到大都没人夸过我聪明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喜欢学习了，早读课上背文学常识，上课就看电影，回家还看电影，写影评，就这样，艺考来了。我才知道我爱得太晚了。

今天我又回忆高考，总觉得那简直是一个时代，那时候我们还玩贴吧，还在QQ空间里当愤青。我跌跌撞撞地奔向北京，为了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面试，减肥一个星期，靠牛奶与水果维持。进到第三试，考官惋惜的眼神，让我明白了结果，我在高铁上让泪横……我后来没有去理想中的大学，只是去了一所普通的学校，但还是选了一个与电影有关联的专业。我在高考这条路上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觉得值得。因为这种失败，让我更加珍惜后来的一切。

进大学的第一年，我除了刷电影、看书以外，做了很多事。我不知道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现在去做对自己有没有帮助，但我

“失败者”的春天

华真一

总觉得我在还以前的债，还给以前那个不爱学习的我……大学第二年，第一次被人发现我的短片有意义，国际人权日那天，我以大学室友为主题拍摄的纪录片《日常生活》作为中方作品代表在挪威驻华大使馆放映。同年暑假在我的家乡潜山，我以非遗弹腔创作的纪录片，获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扶持。在此素材基础上，剪辑出微电影《夏韵·弹腔》，获2019“第四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”大学生单元入围作品奖励。在辛苦拍片的间隙，也会写剧本与小说。在首届“智立方杯”安徽大学生文学创作大赛中，我的小说收获了一个小小的奖，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。如今，我越发写得勤了，陆陆续续有了一些发表的机会，散文《江边》入选由鲁迅文学奖评委王剑冰主编的《2019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》。

2020年春天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片子初剪也完成了。第7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豹奖得主、新加坡导演杨修华通过朋友的直播看到我的片子，当即表示他被深深地打动了，主动要求做我的监制，帮我在海外做推广发行，并且介绍了很多电影同行与我交流。这些电影人大多毕业于国内外一流名校，他们当中有数学、建筑等专业

高材生。特别是一个耶鲁大学的导演，他的剪辑架构特别迷人。我为我从前的认知（学电影不用学数理化）感到羞愧。

这些都是经历，都是我的人生。我以前不是一条有梦想的咸鱼，但我现在特别想像一个中二青年一样对着窗外大喊：“我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


华真一，青年导演、编剧，已独立完成多部影视作品。2016、2017年两次参加高考。本科在读。



1980年中考，我考全校第一，比中专录取线300分还多17分，我很得意，以为从此可跳出农门吃“皇粮”了，没想到却因个矮（身高1.43米）、瘦小（体重37公斤），名落孙山。当年桐城中学录取线才280分，我因家贫，想早点参加工作，替父母分担家庭重担，未填报桐城中学，最后只好上桐城二中。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有些自负的我便对学习不太上心，时常晚自习时去电影院看电影，结果，1982年的高考我以4分之差，连高中中专都没考上。这当头的棒喝却并没让我引以为戒，复读后我依然吊儿郎当，一年后又以13分之差再度落榜。

默默陪父母忙完“双抢”，我毅然决然地外出打工了。

在打工地江西南昌，我和工友天麻麻亮就出工，从湖中取土挑到湖边大堤上修建洪都大道。一百多斤重担一趟一趟挑下来，两边肩膀全红肿了，吃晚饭时一点胃口都没了，只好铲些锅巴用开水泡着强迫自己吃。有无聊工友打趣我，说花费父母许多冤枉钱，没考上大学不说，出来挑土居然还吃不下饭，真是太没用！我当时就火了，恨不得立马就上去和他拼命，可细想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，强咽着开水泡锅巴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我要实际

行动回击他，我能行！

歇工之余，工友们看电视、打牌，我独坐一隅默默看书。那一年半时间，白天干着繁重活儿，晚上我坚持看书。书渐渐看多了，手就有些发痒。《汾水》杂志（《山西文学》的前身）1981年第7期刊发短篇小说《篷山有路》，说的高考落榜青年的一些事，让我很感动。我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《路》寄往长影厂。编辑张笑天老师给我回信说：“剧本写得不错，但改编剧本要经原作者同意。”我只好写信请《汾水》杂志转小说作者——山西晋东南文联张文德老师。张老师很支持我。虽然这个剧本最终未能投入拍摄，但对我鼓舞很大。

后来，我回到老家桐城，当了三年半的民师。1989年，我辞职来到铜陵，在铜陵县塑料厂找了份工作。因我常在《安徽青年报》《安徽工人报》发些散文和小小说，被厂长看中，替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担任厂办秘书，并结合工作实际写新闻报道。此后我为爱岗敬业的塑料车间主任写过一千多字人物通讯，发在《铜陵日报》二版头条；仅用一个午休时间为市电视台拍厂专题

以笔“开道”

吴华

片写好三千多字解说词，让市电视台和厂领导对我刮目相看；之后，我写的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《竞争中标的厂长》，被经济日报出版社收入《安徽省企业家列传》。这篇作品的见报、播出和入书，在厂里产生很大反响，我在厂里从此更受人尊敬。紧接着，我被市作协、影视协吸收为会员。通过自考和函授学习，我取得中文专业大专、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，圆了大学梦。

几年之后，我跳槽到“铜陵第一村”——郊区联盟村，任村办主任，其间写过不少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，都被《铜陵日报》刊发出来。那些作品和好几个整版的“大特写”，让我成为铜陵小有名气的“农民作家”，并因此进入郊区领导视野，于1997年正式被调到区政府，成为全省县级机关唯一的编外“农民秘书”。十多年后，因工作调整，我外出招商，回来后写了一篇随笔《浙闽归来看差距》，引起了市委书记关注，他批转《铜陵日报》配编者按和评论于2008年3月31日头版发表，成为“崛起，铜陵”解放思想大讨论开篇之作，让我这小人从此在铜陵名气更响。

如今，我牵头在铜陵大通古镇领办“大通影视传媒文化产业园”，将其建成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影视拍摄基地，乐在其中，平静而又充实。



吴华，安徽省作协、摄协、影视协会会员，安徽省旅游学会理事，铜陵学院客座教授，铜陵市大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铜陵市影视协、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主席，市作协理事，著有散文集《品读人生》。